

在《明史》、正德《琼台志》和多种《琼州府志》中，都有徐鉴的简略传记，而对其事迹记述最全的，恐怕当属丘■为他撰写的《明故琼州知府加赠资政大夫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公神道碑铭》。这篇2000多字的铭文，灵活运用了顺叙、倒叙、插叙等多种叙述方式，夹叙夹议之间，抒情感怀，叫人至今读来仍难免神伤。

遗憾的是，徐鉴在海南任职时的故迹已然不存，方志中也找不到他的画像。于是，记者近日托人到江苏省宜兴市宜城镇溪隐村寻访徐氏宗亲，得知徐鉴的坟墓由于城市扩建，已经迁往他处，故居也不复存，好在宜兴市档案局提供的一些书籍中，尚有徐鉴故居的旧照。不过，尚在修葺中的徐氏大宗祠尚存，而且将被列为当地的文物保护单位。

受命于危难

在丘■笔下，宣德(1426-1435)皇帝朱瞻基在位初年的国家现状是：“有司贪残庸懦，失牧民之术，以致泽不下究，民多失业。”官吏要么贪赃枉法，要么慵懒懦弱，没有管理民众的才干，使得大明朝廷的恩泽无法惠及生民，老百姓大多无业可就。这种状况对于一个泱泱大国来说，不可谓不危难。

1430年，朱瞻基当机立断，选出一批勤政且有显著政绩的“京官”，分守地方大郡，时为户部郎中的徐鉴被任命为“琼州府知府”。赴任之前，皇帝明确表态：地方官员中，凡有越职和违法的，全部如实上奏；凡是执法无情和玩忽职守者，立即押解进京。

徐鉴深感天子知遇之恩和委任之专，接命后当即日夜兼程赶到海南，宣读皇上的诏书，官吏和百姓听后都说：“大哉！圣言明见万里之外矣。”正式接印上任后，徐鉴按章办事，各级衙门的运作井然有序。据丘■记述，当时琼州的老年人都对年轻人说，这是自前琼州知府王伯贞离任二十年后，才有的一位好官。于是，“莫不室家相庆，欢欣鼓舞，如得更生。”

王伯贞是江西泰和人，洪武年间(1368-1398)来琼，任琼州知府14年，为政宽简、亲和、体恤，曾使一万三千余名流民回归家园，百姓深受其益。如果丘■文中提到的“二十年”是个确切数字，王公去世应在1410年，即永乐八年。

丘■为何对徐鉴如此了解呢？原来，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曾随祖父丘普到府衙拜会徐鉴，受过徐公的点拨，徐公的平易近人让他记忆深刻。

也许是缘分所致，景泰五年(1454年)，徐鉴的长孙徐溥又与丘■同时考中进士，后来又同为宰辅大臣；待到徐鉴和丘普由于孙子贵为首辅，也被加赠为相同的“资政大夫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”，而且还是在同一天。也就是在那一天，徐溥想到祖父徐鉴的坟墓一直没有神道碑文，便请求丘■亲自撰文，说是对其祖事迹最了解的，世上没有比得过丘■的了。

督贪有技巧

海南有很多地方特产，宦官(一般都是皇帝的私使)络绎不绝前来索取，其中有姓阮、韦和冯的三人，每年至少要来一次，阮某有后台，最为狡黠和善于巧取豪夺，另外两人看到徐鉴“端严劲正不可犯”，又是皇上亲自任命的，于是稍有收敛。后来阮某因其后台袁琦犯事而受牵连，也被问斩于市，朝廷将袁琦同党受刑的情况发榜告示天下，在长长的名单中，阮某的名字仅次于袁某。

就在阮某伏法的第二年，又有宦官黄某等三人跟着重蹈覆辙。徐鉴则明确交代所有衙门，凡是他们想要的东西，



徐鉴故居旧照。

了海滨。众密密麻麻，挤满了海岛时，送行的民众的灵柩离开这个了自家的孩子；当哀恸不已，仿佛死于任上，百姓闻讯深得人心。徐鉴死四年间，爱民若子，江苏宜兴人，在琼府，他名叫徐鉴，官员上任「琼州知府」，有一位从北京来的，五八〇年前，

徐鉴：琼州百姓心中的好知府

文图/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

如果不是当得的，一律不给他们；三人贪欲不得逞，便想避开徐鉴直接造访“所部”(驻军机构)，徐鉴则骑上马一路跟着他们，不让他们恣意妄为，为害一方。

丘■感叹道：“琼州从永乐末年以來，老百姓好比饿着肚子背着重物走在荆棘当中，到了那时才得以放下重担走在平地上。不然的话，恐怕造反的事都要发生了！”

除了巧妙地监督来自京城贪婪的太监们，徐鉴还根据官府和民间“困乏”的现状，节省财政开支，宽免延迟债务，怜恤民众困苦。因此，民力稍稍得以复苏，百废始兴之后，徐鉴又“教民种艺，兴学校”，使得“民俗为之一变”。

改民间陋习

居住在深山里的黎族同胞，一直来自耕自食，从不出山为害，但驻军图谋他们的财物，经常挑衅生事，然后加以

镇压来邀功求赏。徐鉴秉公制止军士的不法行为后，黎族地区秩序井然，百姓安居乐业。然而，当时的一些黎族群众耕作和打猎所获，往往换牛祭鬼。他们有病不吃药，而是听信巫言，杀掉耕牛来祈禳。

徐鉴闻知叹息道：“封闭的民众要让他们慢慢明白道理。佛家和道家的学说虽不纯正，但不害物命，对引导他们转化应该有所帮助。”于是，他允许有名望者修整或新建寺观，吸引黎胞前去祈求，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。果不其然，黎胞有病逐渐不再买牛杀生，家庭经济负担轻省许多。

对于此事，丘■认为：“徐公的用意是因循民间已有的习俗，慢慢转变他们的观念，逐渐归于正统，而不是通过求神拜佛来达到牟利的目的。”

由此可见，徐鉴和丘■对于当时非主流的佛老学说，以及民间兴建寺观的行为并不认同，但为了引导民众脱离巫术的迷惑和辖制，却不妨对其加以利用，作为转向主流信仰或学说的过渡，仅此而已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儒家学说才是正统的学问。

名留海之南

徐鉴“为政简易，不任吏胥，事至立断，不立文案，大率以劝化为主，不用刑法”，于是有人对此颇有争议，估计也有人当面质疑过。他解释道：“地方官就像是老百姓的父母，父母教育孩子，不听话才用鞭子打他们，如果孩子听话，还需要鞭打吗？”

“公在郡，仅四年，而郡中十数年之积弊，一旦革去，如水洗垢。三州十邑之民，方爱戴祝颂之无已，而公病不起矣，时宣德甲寅九月二十六日也。远近闻讣，巷哭家祭如丧所生。”

1434年，徐鉴病故于任上，琼州百姓悲痛不已。但先于徐鉴数日去世的琼州府同知(副职)程某，却很不得民心。当时有这样的民谣：“千两黄金买知府，一张白纸送同知。”且传诵多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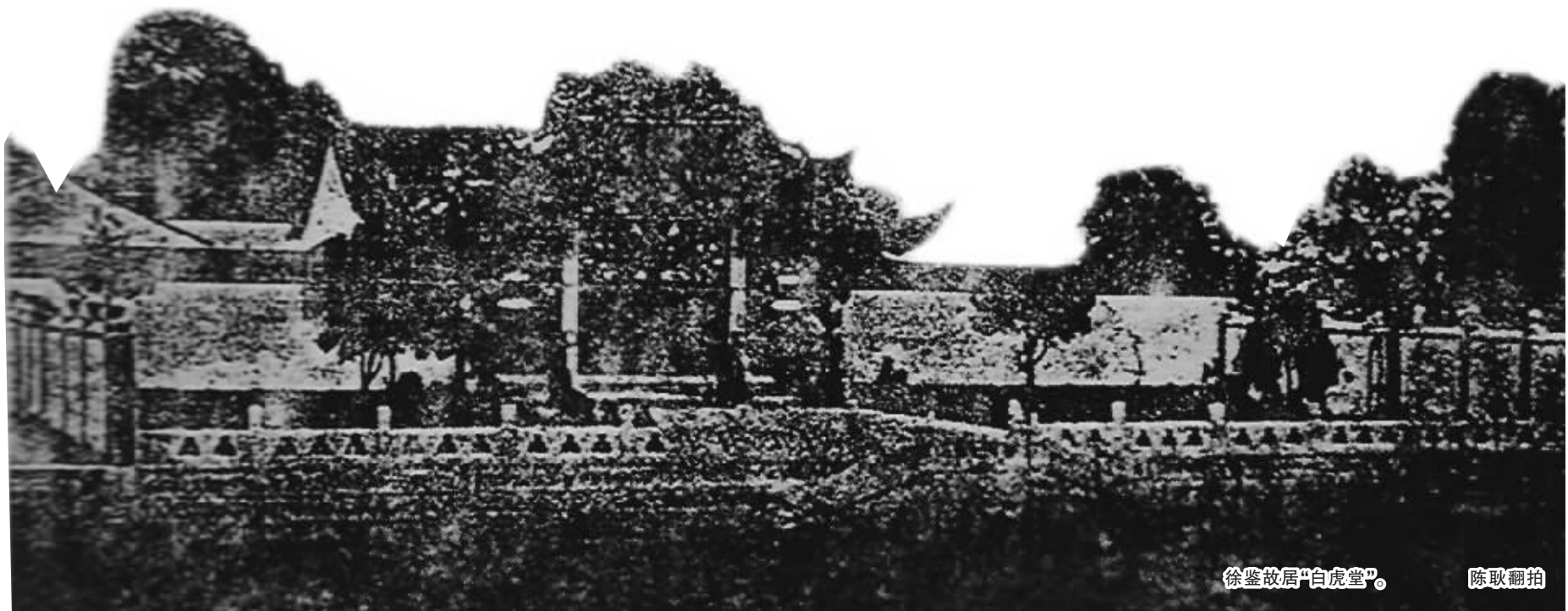
徐鉴灵柩被送回内地时，府城一带的民众自发送到海边，由于人太多，在海岸上站得水泄不通，他们一直目送不见船的踪影才回家，然后刻好徐鉴的灵位，安放在学祠里祭祀。徐鉴病逝时仅64岁，当时其长孙徐溥已6岁。徐鉴有5个儿子、15个孙子，长子是徐琳，徐琳生徐溥。

徐鉴离世第二年，也许是因为病虫害或大旱的缘故，琼州粮食收成大大减少，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，老百姓私下说道：“要是徐公还在，我们哪会如此呀！”

这一个侧面很好地说明了徐鉴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。而他爱民若子的事例，用丘■的话“循吏不足尽之也”来概括，也许最为贴切。一个好官的事迹是说不完的，丘■也不可能全部记载下来。

当徐鉴还是一名刑部主事时，就非常认真地对待案情，对“死狱”(死刑)更是不轻易下结论，因此，经过徐鉴之手的囚犯，没有一个喊冤的。曾有一件疑案，徐鉴从轻处置，当事人觉得他德行好，事后想送金帛表示感谢。徐鉴婉拒后说：“你罪轻，我不敢用重法惩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；要是你罪重，我哪敢从轻啊。轻重在你，跟我没有关系。”一时间，徐鉴在京城“法吏”中，是以廉洁和谨慎出了名的。■

【注：本文的引文除特别说明外，均出自丘濬的《明故琼州知府加赠资政大夫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公神道碑铭》。】



徐鉴故居“白虎堂”。

陈耿翻拍